

特藏文献中的“流传印记”及其编目*

□毛瑞江

摘要 提出特藏文献中的“流传印记”这一概念,指出流传印记对特藏建设有重要意义:彰显藏书价值;勾勒图书传播轨迹;展示藏书之间的内在联系;见证图书馆发展史。并就特藏编目中流传印记的规范著录及其作用提出自己的看法。

关键词 特藏 流传印记 藏书印 特藏编目

1 流传印记

对一本书而言,它既有“先天信息”,也有“后天信息”。作者、出版者、刻工等赋予它最初的生命,这属于“先天信息”;当书出版后,读者、收藏者、书商延续了它的生命,并给它留下了许多印记,这属于“后天信息”。具体来说,“先天信息”是其成型最初所承载的信息,包括书名、责任者、内容表达、页码等信息;“后天信息”是其被收藏、转赠与流传过程中留下的痕迹,包括藏书章、藏书票、赠阅信息、文本批注、题字、书商信息、借阅信息等。这些在流传过程中产生的“后天信息”,可以概括为“流传印记”。流传印记作为特定的符号具有自己的独特性,承载着强烈的历史文化意义。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其进行分析和研究,并进行规范合理的著录。

1.1 藏书印与藏书票

人类文明有数千年的藏书史,出于对图书的热爱与珍视,作为书香情趣标志的藏书印与藏书票应运而生。藏书印又称藏书章,是我们的国粹,已有上千年的历史。学界大致认为“兴于唐而盛于宋,唐太宗之‘贞观’二字连珠印,玄宗之‘开元’二字连珠印,皆用于御藏书画,其滥觞也。”^[1]现在图书馆收藏的书籍都盖有图书馆的藏书章,我们每个图书馆工作者都知道新的书刊到馆要逐一盖章,是采编部门书刊加工流程中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藏书章是图书馆财产所有的标志,是读者用以分辨图书收藏单位,以便准确及时归还的提示。而藏书票是舶来品,

因画面富有艺术性,被称为“纸上宝石”、“版画珍珠”,其出现比藏书印要晚。世界上目前存在的最早的一枚藏书票出现在大约 15 世纪的德国,据考证,其创作时间大约是 1450 年。我国发现的最早的藏书票是 1914 年的关祖章藏书票。

目前学界对藏书章与藏书票的研究颇多。主要包括:1)藏书章、藏书票解读及其历史介绍;2)中西藏书票艺术对比研究;3)个体藏书楼、图书馆藏书章考证介绍以及名人藏书印研究;4)利用藏书印鉴别古籍版本,考证藏书的流传情况。

1.2 藏书印与藏书票之外的流传印记

流传印记不仅仅局限于藏书票和藏书印,还包括财产登记号、赠阅信息、文本批注、借阅信息等这些在文献流传过程中留下的痕迹。几乎所有图书馆的文献都有其作为收藏机构的财产登记号。财产登记号是图书馆为了管理、统计方便,赋予每个文献的特定代码,一般连续编号,一件文献只有一个财产登记号。赠阅信息一般出现在捐赠文献中,西安交通大学图书馆珍藏着著名校友钱学森先生捐赠的 9 本书,这些书上都题有“西安交通大学留存,钱学森,2001 年 12 月 11 日”。这些赠阅信息,不仅见证了钱学森先生对母校的深厚感情,还默默地传递给我们更多的学术、文化、教育意义。文本批注是读者的阅读行为所产生的信息,我国四大名著之一的《红楼梦》,除了流传过程中其他未知因素外,因不同的批注甚至衍生了不同的版本。借阅信息也是跟阅读行

* 陕西省图书馆学会 2014 年度研究课题“特藏文献中的‘流传印记’及其编目研究”(课题编号:141020)、西安交通大学图书馆 2013—2015 年度馆内基金项目“近代西文科技期刊在中国的传播——以西安交通大学图书馆‘百年老刊’特藏整理研究为例”的研究成果之一。

通讯作者:毛瑞江,ORCID:0000-0002-7219-8883,89075911@qq.com。

为相关的信息,它能告诉我们一本书被哪个读者借阅,对于研究书的文献价值以及借阅者的阅读兴趣相当有用。当然并非所有的行为都会留下印记,而目前所见的这些印记给予我们的重要信息,在特藏建设中具有重大意义。

2 流传印记对特藏建设的意义

大数据时代,高校图书馆的资源呈多样性,数字资源极大丰富,但同时同质化现象严重且差异性缩小。在此背景下,特藏文献凸显其独特价值。特藏文献是体现图书馆及所在高校文化传统和特色的重要指标,特藏建设不仅是收集、保存文字符号系统外壳形式之上的知识,更重要的是探寻内隐在文字符号之后深层的东西,这些深层的东西即人们在长期的文化历史发展中积淀而成的精神传承、思维方式等。特藏文献中有相当多的文献有流传印记。这些流传印记使特藏文献置身于一个生动活泼的文化整体中,对其加以还原和分析,将捕获它所体现的价值。

流传印记对高校图书馆中的特藏文献的重要性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1 彰显图书价值

对单本图书而言,书中所带的流传印记越多,越是与名人有关,便越能体现其价值。整理西文特藏的过程中,笔者有幸看到一些西文教材所携带的借阅卡,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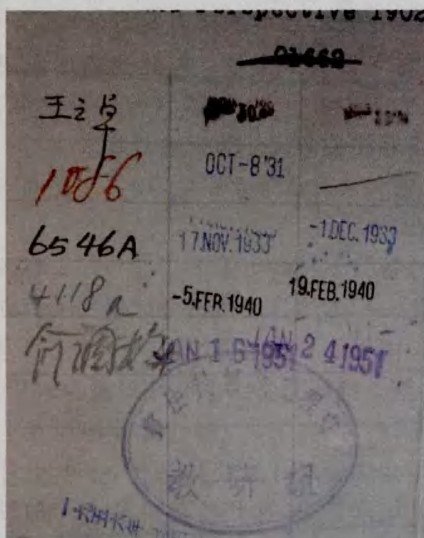


图1 *Shades and Shadows and Perspective* 的借阅卡

这张借阅卡是我馆收藏的1902年版、题名为*Shades and Shadows and Perspective*的西文书所携带,显示了两位借阅者的名字:王之卓,俞调梅。王之卓是我国航空摄影测量和遥感学科的主要奠基人和开拓者,1932年毕业于交通大学,曾任交通大学校长,在困境中为保存交通大学校产作出了重要贡献,1980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而俞调梅1934年毕业于交通大学土木系,是我国著名老一辈土力学与基础工程专家。两位学界泰斗都曾借阅此书,可见此书在相关学科发展中承担了不小的使命,而王之卓与俞调梅二位前辈的研究者或者也可以从中得到一些背景资料。

2.2 勾勒图书传播轨迹

依据流传印记可知特藏文献的流传经过,为某个历史阶段的研究提供背景资料,丰富藏书文化。我馆的“百年老刊”特藏中收有一册1850年的《英国皇家学会论文摘要》,扉页上贴有一张藏书票,承载了很多历史文化信息,见图2。它是由一位私人藏书家赠送给欧文斯学院,而欧文斯学院即现在维多利亚曼彻斯特大学的前身。票面文字“ARDUUS AD SOLEM”,为曼彻斯特大学的校训,字面意思是“面朝太阳”,有积极启蒙的意思。该格言出自维吉尔(Virgil)的叙事诗《埃涅伊德》(Aeneid)。此藏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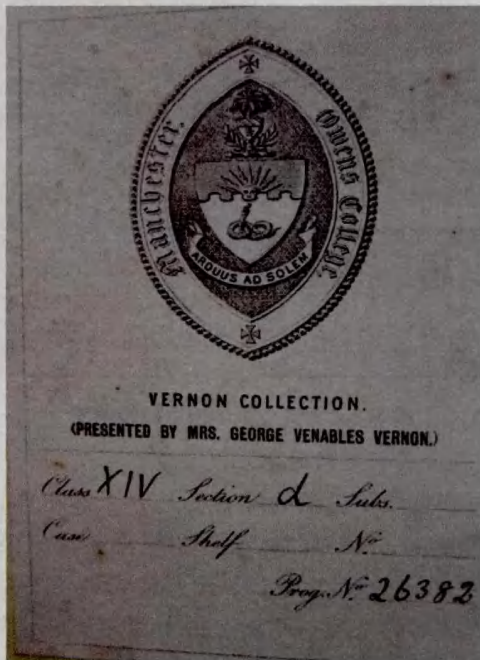


图2 1850年的《英国皇家学会论文摘要》扉页上的流传印记

票图文并茂地展示了曼彻斯特的大学精神,百年沧桑,辗转流传,如今该期期刊完好地保存在西安交通大学图书馆。从这个藏书票中,我们仿佛看到了希腊、罗马古典文明与现代西方文明的一脉相承,也看到了从私人藏书到图书馆公共藏书、从西方到东方的文化传播奇观。

我馆“百年西文科技老刊”特藏中的欧美大学图书馆印章众多,现列举如下:如图3所示,左上印章“Royal college of science London library (伦敦皇家科学学院图书馆)”是馆藏1891年*Nature*的流传印记;左中印章“Birmingham University library (伯明翰大学图书馆)”是馆藏1868年刊*Institute of Mechanical Engineers Proceedings*的流传印记;左下是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的剔除章“BODL. LIB. CANCELLED”,我馆收藏70册有百年历史的《哲学汇刊》基本都有印章“Harvard University Library Of the Division Of Engineering”(哈佛大学工程分部图书馆),是馆藏1909期*ASME*上的流传印记。这些欧美大学图书馆藏书章见证了近代中国在欧风美雨洗礼之下西学东渐的过程,从一个特殊的角度展示了中华文明对西方文化的吸纳和存取的历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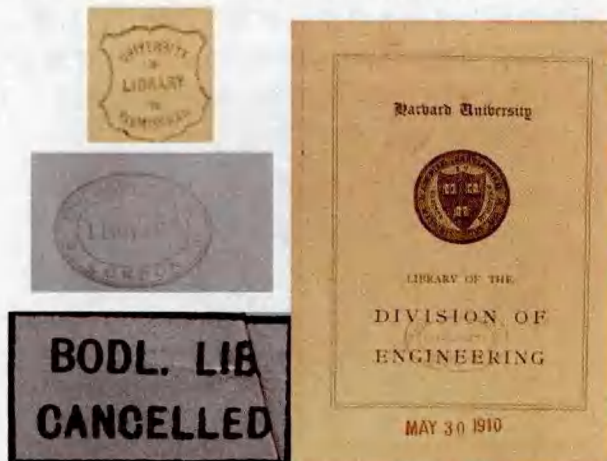


图3 欧美四个大学图书馆藏书章

2.3 展示藏书之间的内在联系。

每宗特藏所包括的藏书都是一个有机体,书与书之间必有一定的联系,流传印记往往是记录书与书之间关系的纽带。比如云南师范大学图书馆在西南联大文献的整理和利用上做了很多工作,其中西南联大图书特藏室成立于2005年1月,此特藏就是基于1946年西南联合大学中的三校北归时留下的盖有“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图书馆”印章的部分藏书所

建,其中,中文图书约4280册,西文图书约2086册,线装书38种,报纸12种,期刊14种^[2]。无独有偶,北京大学在恢复其“西文东方学”特藏时,也是依据文献上是否盖有字母“O”来挑选文献^[3]。这也给特藏建设者一个启示,每一宗特藏都给予特定的符号以示其独特,同时永远记录与展示它们之间的有机联系。

2.4 见证图书馆发展史

通过梳理流传印记,还可以见证图书馆发展史,为某个历史阶段的研究提供背景资料,丰富藏书文化。笔者在整理收集本校特藏过程中,发现通过整理本校图书馆各个时期的馆藏章,见图4,可见证西安交通大学走过的百年历程以及图书馆的藏书史。

3 特藏编目对流传印记的著录

流传印记对于特藏建设的意义如前所述,而图书馆的馆藏目录是读者最常用的信息查找途径,著录有流传印记的机读目录对特藏资源的深度检索利用有重要意义,否则,公众和相关研究者除非亲自翻阅这些特藏文献,对这些信息一无所知。流传印记的机读目录著录,目前少有人提及。笔者拟从选取著录范围、规范著录字段等方面提出自己的观点。

3.1 选取著录范围

选取跟名人、重大历史事件相关,或跟所处地域、所属高校特藏主题相关的流传印记著录。

流传印记的著录,属于特殊著录,繁琐而且要求精细,如果每宗特藏中的所有文献的“后天信息”都著录,将是海量的工作量。因此我们选取跟名人相关、跟重大历史事件相关,或者跟所处地域、所属高校历史主题相关的流传印记进行著录。

3.2 规范机读目录著录字段,提供完整揭示与便利的检索点

国外特藏编目经历了手工卡片——机读目录检索本地化——机读目录检索全球化三个时期。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图书馆在制作手工目录卡片的时候,古籍与特藏部要制作额外单独的卡片,以前的拥有者、捐赠者、藏书票、装订者等都要在卡片上体现。但是在之后的计算机编目中,一般卡片上的信息都录入机读目录,这些特藏目录卡片却没有享受到相同的待遇^[4]。直到1979年的IRLA(Independent Research Libraries Association)报告,该报告是互联网环境中聚焦特藏编目发展标准的真正开始。



图4 交通大学校名沿革与馆藏章对比图

报告提议为古籍与特藏提供新的机读目录字段，包括特殊复本与流传信息^[5]。这说明在许多普通图书编目员使用新的英美编目条例—AACR2的时候，特藏馆员正在想方设法建立 MARC 标准来容纳特藏文献的特殊需要，他们渴望一种既能描述书的先天信息同时还能著录其出版之后的后天信息的著录规范并且提供检索词。数年之后，国会图书馆制定了 *Bibliography Description of Rare Books* (BDRB)^[6]，其二版在 1991 年出版，改名为 *Descriptive Cataloging of Rare Books* (DCRB)^[7]，两者都包括了记录特殊复本信息：BDRB 7C18 和 DCRB 7C18。当前普通文献和特藏文献都使用 AACR2、ISBD(A) 和 2007 年出版的 DCRM(B)。特殊副本的信息著录指导在此三者中都可见到：AACR2 的 1.7B20、2.7B20、2.18F1；ISBD(A) 7.9；DCRM(B) 7B19.2。DCRM 取代了 DCRB，尽管修订没有完成，RDA 取代了 AACR2，RDA 的 2.15 规则，标签为“守护历史”(Custodial history)，包含了著录流传印迹的指导条文。RDA 比 ISBD 更进一步，它不仅对资源进行著录，而且还提供书目数据的检索并揭示其间关系^[8]。具体到机读目录的著录字段，US-MARC 中，著录流传印记的字段为：541 著录最近的

来源，即时采访源附注，561 著录历史来源，所有权与保管史。590 著录当地和特殊复本信息，比如“作者呈送本”或者“特殊复本”信息，每个复本的特殊信息，公用的子字段 *z* 可能包括自由的文本陈述，比如“作者签名”。7 字段做检索点比 1 字段用的多。

国内古籍工作者或研究者很注重善本古籍，一般书目著录都会记录其本身携带的流传痕迹，比如藏书章等，并据此来考证其前世今生、流传经历以及版本。比如《山东大学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著录非常详细。著录项目包括：撰者，印本，函册，行，字，格，白口、黑口，有无鱼尾，序，跋，刻工，版本，有无藏书印等。而对于“新特藏”中既不是古籍，但又不同于一般复本的特殊复本，则关注不够。目前国内虽有某些高校出版了一些主题特藏书目，比如北京大学图书馆和台北胡适纪念馆联合整理编著的《胡适藏书目录》，著录了胡适藏书的书名、著者、著作方式、出版项、函册、馆藏地、附注等内容，并在附注项列出藏书中的“后天信息”即批注、题记、印章、签名、夹纸等详细资料。但尚未开展机读目录中流传印记的著录，对此“后天信息”的著录，国内我们可参考古籍编目以及机读目录中对捐赠者信息的著录。有同行将藏书印著录在 306 字段（出版发行附注项）^[9]，

北京大学关于赠书者的著录是统一增加 919 字段。CNMARC 的数据元素中,316 著录特殊复本信息,317 著录文献出处、来源等附注,如图版、作者和(或)所有者的签名、印鉴等记录在 317 字段。与 USMARC 一样,7 字段提供检索功能。

综合以上所述,笔者建议特藏编目中的流传印记著录应采用表 1 所列字段。

表 1 MARC 记录字段

字段内容	MARC21 字段	CNMARC 字段
采访源附注	541	317
所有权与保管史	561	317
当地和特殊复本信息	590	316
相关责任者检索	7--	7--

特藏文献查阅的便利与揭示的深度将刺激相关研究,尤其是人文社科的研究者。而一个富有活力的、成功的特藏部门将把提供方便获取的目录作为工作基础^[10]。在线目录和文献数字化明显增加了文献的可获取性。著录有流传印记的书目检索结果的呈现,是促进特藏资源宣传推广并延伸其服务范围的有效途径。此项举措体现了“书是为了用的”这一原则,方便读者通过目录检索到文献的“先天信息”与“后天信息”,另外特殊细节著录可代替翻阅文献,有益于保护文献,也方便特藏馆员管理文献。

参考文献

- 1 邓散木. 篆刻学[M]. 杭州: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 2013: 93

- 2 朱曦. 特色文献资源的文化学意义和符号学价值[J]. 大学图书馆学报, 2009, 01: 72-75
- 3 北京大学图书馆. 特藏西文东方学介绍. [2015-04-27]. <http://www.lib.pku.edu.cn/portal/zy/zzy/tecang>
- 4 Lundy, MW. Provenance evidence in bibliographic records — demonstrating the value of best practices in special collections cataloging [J]. Library Resources & Technical Services, 2008, 52 (3): 164-172.
- 5 1979 IRLA report — rbms — rare books & manuscripts section [EB/OL]. [2015-03-10]. http://rbms.info/committees/bibliographic_standards/1979-irla-report/
- 6 Library of Congress. Office for descriptive cataloging policy, bibliographic description of rare books: rules formulated under aacr 2 and isbd(a) for the descriptive cataloging of rare books and other special printed materials[M]. 1981: 53. [2015-03-10]. <http://babel.hathitrust.org/cgi/pt?id=umn.31951000487323e;view=1up;seq=1>
- 7 Washington, D. C. . Library of Congress. descriptive cataloging of rare books, 2nd ed. [M]. 1991: 64. [2015-3-10]. <http://babel.hathitrust.org/cgi/pt?id=mdp.39015025368443;view=1up;seq=5>
- 8 芭芭拉·B·蒂利特, 张钰龄. RDA 与中国: 编目的国际化[J]. 中国图书馆学报, 2012, 06: 14-21
- 9 张太平, 阎瑞萍. 古籍机读目录建设[J]. 图书馆理论与实践, 2002(6): 74-75
- 10 Neil Darbey, Helen Hayden. Special collections for beginners [J]. New Library World, 2008, 109(5/6): 258-272

作者单位: 西安交通大学图书馆, 西安, 710049

收稿日期: 2015 年 3 月 11 日

Provenance Evidence in Special Collections and Its Cataloging

Mao Ruijiang

Abstract: This paper presents provenance evidence in special collections development, makes analysis on its importance in special collections such as manifesting the value of the collections; outlining books dissemination track; showing the inner link between collections; and providing witness of the library development. Then it discusses how to catalog it in Machine readable catalogue.

Keywords: Special Collections; Provenance Evidence; Book Seal; Special Collections Cataloging